

逆境中毛泽东的相忍为党与顾全大局

毛泽东有着极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始终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集体,即使受到不公正对待,只要是组织作出的决定,他依然坚决服从。

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就指出:“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对此,他始终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宁都会议上,王稼祥等不同意见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他们的意见只属少数。会后,王稼祥前往送行,毛泽东安慰他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施昌旺著:《王稼祥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0页)

1933年6月,博古在宁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坚持按照组织程

序提出申述,认为前次宁都会议确定的红军主力北上、先发制人粉碎敌军于“进剿”合围之前的进攻任务并未实现,而第四次反“围剿”恰恰是在前次会议严厉批评的他和朱德发出的训令所预定战场上取胜的,因此对前次会议作出的错误决定应予纠正。

但是,博古在作结论时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对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02页)

宁都会议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在党内处于少数被孤立地位,但他依然从容坦然,自觉维护党的团结一致,通过努力做工作,争取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干部所接受。

遵义会议的成功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积极争取多数的结果。正如贺子珍回忆毛泽东这段经历时所说:“在遵义会议之前,他认识到,如果不能让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认识王明路线的错误,我

们党就要垮台,红军也要垮台。他变得更耐心了,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终于争取到多数,扭转了形势。”(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页)

特别是争取到从原教条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的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

王稼祥曾回忆说:长征出发后,“我向毛泽东同志表示:目前形势已非常危急,如果再让李德这样瞎指挥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挽救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采取果断措施,把博古和李德‘轰’下台。毛泽东同志听后十分赞同,他考虑了当时的情况,又担心地说:‘你看能行吗?支持我们看法的人有多少?’我说:‘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毛泽东同志高兴地说:‘好啊,我很赞成。’并要我多找几位同志商



量商量。”[《王稼祥同志谈遵义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47—248页]

在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后,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意见终于在遵义会议上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成功实现了历史转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曾对贺子珍感叹地说:“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页)这确是毛泽东历经坎坷后更深一层的体会,同时也是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民主集中制、自觉维护党的团结一致的明证。

(摘自《纵横》)

是谁最先将长征讲给世界听

1934年10月长征开启,陈云最初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行军途中改任军委纵队政治委员,亲历长征路途上的重重艰险。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天全县。陈云奉命悄悄离开长征队伍,就连平素最接近他的人都不清楚其去向。

实际上,他是去上海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他穿越匪患多发地带,经雅安等地辗转抵达成都,随后继续前往重庆,搭乘轮船赶赴上海。

抵达上海之后,局势远比预想严峻,上海地下党组织接连遭到严重破坏,已经很难开展工作。共产国际指示,若陈云滞留上海,随时面临生命危险。陈云与潘汉年汇合,准备奔赴莫斯科,加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潘汉年先行启程,陈云留在上海等候赴苏的机会,之后在宋庆龄帮助下秘密离沪。

在上海等候船只的一个多月里,陈云开始梳理长征见闻,着手写文稿初稿。1935年



9月抵达莫斯科之后,他已完成全部文稿。彼时国民党大肆散播谣言,将红军妖魔化,到处渲染“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虚假说辞。陈云意识到,如果不能把真相公之于众,谎言将会持续流传,因此这份文稿内容应当尽快对外公开出版,让外界看见真实的红军。

但在国民党严密的书报审查情况下,倘若直接以共产党员身份记叙长征,书稿既无法出版,作者本人也难逃迫害。陈云想出一个巧妙对策: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视角展开叙述。

在这本名为《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书中,作者设定的叙事身份为: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四年的军医,1933年在江西南丰黄陂战役中被俘。他原本以为性命难保,恰逢红军缺少军医,于是被留用。文稿借这名“军医”的第一视角,记录长征路上的所见所闻。

谈及红军领导人,书中这

样写道:“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

书中有一处细节令人印象深刻:毛泽东在路上遇见一位饥寒交迫、寸步难行的老大娘,当即脱下身上毛线衣,又拿出随身被单送给她,还安排人送去一斗白米。老人连连道谢,带着笑容离开。这类小事看似细碎平淡,但是由“军医”的旁观者口吻来记述,便有很强的分量和说服力。

书中记述抢渡金沙江的段落,同样充满生动细节:最初仅征集到十八名船夫,之后增加至二十七人。红军渡河司令部一边做好宣传动员,一边给予优厚报酬:船夫日夜劳作,可领取五块现洋,并且膳食充足、常有肉食;而指挥渡河的干部,每餐只吃青豆等粗

简素食。

《随军西行见闻录》通篇文字不见夸张赞颂,都是平实冷静记述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以及战士的英勇、领导人的谦和。书中写到朱德,提及他的外号是“伙夫头”,衣着与普通士兵别无二致,从外表很难分辨高级将领身份。这类鲜活细节,远比口号更打动人心,宣传效果也更突出。

书中结尾立足时代局势发出感慨:彼时全球法西斯势力持续扩张,中华民族更是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陈云借军医之口写下掷地有声的句子:“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时至今日读来,依旧振奋人心。

1936年3月,《随军西行见闻录》在法国巴黎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全民月刊》连载。

1936年7月,莫斯科出版该书单行本,这是最早由长征亲历者撰写、系统记叙红军长征历程的公开出版物。

(摘自《北京日报》)